



滇缅路上的生死兄弟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梁昆 彭青林 特约记者 王仪 图\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

2月29日,海南岛初春的早晨,万宁龙滚镇青山园村平素寂寥的一间农家小院,迎来了90岁的谢章农老人久违的朋友——91岁的吴惠民老人。两位经历了世纪风雨与战火洗礼的老人,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。

谢章农老人生病有些时日了,也因为行动不便,这两位密友原本每年数次的相聚渐渐稀少了。阳光静静地洒落在谢章农老人的脸上,他略显瘦削苍白的面容,此刻也绽放出一丝初春的暖意。

这两位老朋友,曾经共同战斗在滇缅公路上,他们都是海南同乡,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——南洋华侨机工。1939年9月,谢章农和吴惠民同一批登上从南洋归来的轮船来到了云南昆明,他们一同经历了日本兵炮火在滇缅公路上的狂轰滥炸,一起为抗日前线的战士们冒死运送军火和药品,又一同无奈地看着身边的海南同乡们因为战火、翻车等事故,永远地长眠在了滇缅公路上。那段在滇缅公路上生死与共的日子,如刀刻一般深深印在老人的心版上。

2009年初春,因为海南日报记者对抗战时期南洋华侨机工的寻访,这两位滇缅公路上的南侨机工又再度聚首。

谢章农用有点含混不清的语调说,“我们一定要常联系,有什么消息要记得通知我。特别是南侨机工的活动。别忘了!”

“一定记得,一定记得。”吴惠民连连点头。

吴惠民:为上滇缅路而改名

比起谢章农,吴惠民的身体还算得硬朗,一身蓝色老款西装,头戴宽沿大礼帽,足蹬一双年代有些久远,从南洋带回来的深棕色皮鞋,脸上挂着宽和的笑。

1919年吴惠民出身于琼海中原镇九曲江一个贫寒的家庭,父亲在他3岁那年便撒手人寰,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带大,又省吃俭用让他读书!1933年,吴15岁那年母亲让他投奔南洋新加坡的叔叔。“叔叔是南洋五四公会的理事,他把我带到公会做杂工。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,叔叔对抗日活动很热心,经常周末带着我去抗敌后援会,参加为祖国抗日发动华侨募捐的活动。”

1938年,日军轰炸广州,吴惠民当时年纪尚小,但满腔热血,对日军的侵略行径愤慨之至,他自愿参加了新加坡华侨举行的示威游行。

19岁那年,踌躇满志的吴惠民觉得新加坡当时还是殖民地,良园虽好终究不是自己的祖国,便暗下决心投身到抗日救国的一线去,走到最前线跟敌人拼。刚好此时新加坡南侨公会主席陈嘉庚先生号召有技术、懂开车的华侨工参加华侨机工团归国支援抗战,吴惠民立即牢牢地把握住了这个机会。

“我原本叫吴东彪,叔叔不让我回来,因为父亲早逝,我由母亲一手带大,叔叔舍不得我走。但我决心已下,就改名吴惠民,不让叔叔知道。还没有学会驾驶我就去报名,人家不肯收,我就每晚去租小汽车,跟一位的士司机到加东去学,一周便学会了。这才报上了名。”

吴惠民还记得,1939年8月14日——他离开新加坡的日子。“当时的场面相当隆重,我们身着机工制服,新加坡各行各业代表为我们送行。”

离开新加坡后,吴同批的南侨机工经过越南到了昆明,在西南运输处训练。在滇缅路上行车异常艰辛,不仅山路崎岖难行,路上野兽众多,还要躲避日本人的

1939年9月,海南同乡谢章农和吴惠民同一批登上从南洋归来的轮船,辗转来到云南昆明,他们一同经历了日本兵炮火在滇缅公路上的狂轰滥炸,一起为抗日前线的战士们冒死运送军火和药品,又一同无奈地看着身边的海南同乡们因为战火、翻车等事故,永远地长眠在了滇缅公路上。



滇缅公路穿行在高山大河间。

◀琼籍南侨机工谢章农(左)与吴惠民老人,经历了世纪风雨与战火洗礼。 王仪 摄

飞机。“我们的车队经常受到日军的干扰,3000多南洋去的华侨机工,有近三分之一在路上牺牲了,三分之一抗战结束后回到了南洋,还有三分之一活着的机工留在了祖国。”

1940年,吴惠民结束了滇缅公路上时间不长的运输任务后,被当局派往重庆机械制造厂第二厂当修理工、驾驶员,巧遇一位当时在重庆担任政府要职的海南文昌老乡,经他推荐和保送,吴上了黄埔军校,从排长晋升为连长,最后当上了降落伞部队的队长,到广西打日本。

日本兵投降后,调往广州的吴惠民迫切地思念母亲,寄家书一封返乡。母亲接信后高兴异常,回信一封,说家中订下“娃娃亲”的未婚妻还在等他,尽快回来结婚。“我便离开了部队回了老家,也因为我所在的部队掉转枪头要打内战,我不愿意中国人打自己人,所以母亲命下,便速速返乡。”

之后吴惠民在文革中所遭遇的崎岖坎坷的命运,与留在国内的南侨机工们都是相似的,他一直和琼海的老伴相守过着农耕生活,直到前些年她离去。“我的老伴人非常好,与我共度甘苦,现在儿孙孝顺,我很满足。”幸福写满老人开心的笑脸。

谢章农:悬崖边捡回一条命

比吴惠民还要小1岁的谢章农,1939年报名参加南侨机工时年仅19岁,当时招募机工要求报名者至少要20岁。谢章农偷偷多报了1岁,才闯过了这关。

1939年2月,谢章农看到新加坡报纸上的招募公告,就决心回国服务。作为家中三代单传的独子,他深知父母决不会同意自己报名,也像吴惠民一样将原名“谢锦善”改为了“谢章农”。

临行前一天,谢章农想到自己即将告别家人远行,他不敢告诉父母,而是告诉了姑母,让她替自己向父母告别:“我这一走,抗战胜利了就回来侍奉你们老人家,如果回不来也请勿挂念,就当没生过我这个不孝子。”

“你的父母都老了,你又是独子,怎么说走就走呢……”向来疼爱谢章农的姑母又气又怜惜,两人抱头痛哭。

谢章农还是坚决回国了。1939年9月,他和吴惠民作为第9批南侨机工到达昆明,并被分配到运输队,开始了滇缅公路上的运输生涯,一干就是3年。

滇缅公路自昆明至缅甸腊戍,有许多路程都是在高山大河之间穿行,一路悬崖陡坡深谷,还要面临日本飞机不时轰炸骚扰,行车十分危险,稍有不慎就可能车毁人亡。

谢章农和机工同伴们用精湛的驾驶技艺克服了这些困难,把国内急需的战略物资运回国。他们还总结出来一套对付日军飞机轰炸的方法:下坡不用怕,上坡细观察;敌机来了利用弯道和它“捉迷藏”,让敌机找不准目标。

尽管如此,滇缅公路上的事故还是很多,谢章农自己就曾差点冲出悬崖。“那是从下关去楚雄的路上,非常险,弯道大,下坡时方向盘坏了不能自己回位,还好比较镇定,用力转回来,路边一堆土石又挡了一下,才没有冲出去。下车一看,一个前轮已经悬在半空中了,下面悬崖深不见底,吓得冷汗都流出来了。”他一个人在原地守了两天,等来工程车把车吊回路上,又开着上路了。

此后,谢章农依旧冒着生命危险在滇缅路上来回奔波。从缅甸到昆明,顺利也要10多天一趟。“路上哪里有弯都熟悉的很。”谢章农在这条抗战生命线上一直服务到1942年日军占领缅甸,炸断惠通桥。随后,他考入当时的滇西战时干部训练团。1949年随所在部队起义加入解放军。解放后直至复员,终于回到阔别近20年的海南。

不能忘怀:滇缅路上的生死兄弟

和吴惠民、谢章农同一批回国抗战的还有不少海南同乡,琼海市九曲江人黎锡宽就是他们常念叨的一位。3个人的家恰好离得很近。但是在1941年下半年,他在执行一次运输任务的途中因意外去世,牺牲时才20出头。

“这个兄弟过世的时候,身上还穿着我的衣服。”谢章农动情地说,他们3个人在队里关系最好。早在1937年“卢沟桥事变”后,3个兄弟就参加了“南洋抗日后援会”,每周都要参加街头募捐活动,还亲手做了纸花义卖救国。像黎锡宽这样把生命留在了西南边陲的海南籍南侨机工还有很多。以至于国内的司机称南侨机工是“番仔兵”,不怕死。

在吴惠民、谢章农老人身上会发现很多共同点,比如他们对坎坷遭遇的平和与乐观,苦难磨砺了他们的性格。

今天还健在的海南籍南侨机工,已是少之又少。前两年,机工后代陈勇还在海南寻访到了3位健在的南侨机工。而今天,只剩下吴惠民、谢章农两位老人了,另一位,住在东方市八所镇的黄迎风已经过世。

如今,吴老的身体仍然硬朗,每天坚持跑步锻炼,动作灵便。谢老则已有些行动不便,总是坐在一张躺椅上,说到激动之处便需要缓一缓。两位老人坐在一起总是不停地说起那些滇缅路上的往事,说到长眠在滇缅路上情同手足的海南同乡,泪水从老人的眼角悄悄滑落。